

田野何在？*

——个人经历与浅见略述

王士元

提 要：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虽不多，足迹却涵盖了墨西哥、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广西大瑶山以及云南、四川等地。本文略述我到这些地方考察的趣事，再从这些经验出发，提供关于我对声调语言和语言接触的观察，并从宏观的人类迁徙、人种融合及文化交流的角度，论及中国西南方新发掘的三星堆文化，最后寄语未来的语言学研究能早日揭示出有关古代巴蜀文化的语言样貌。

关键词：东干 语言接触 辨义特征 多元一体 三星堆



汉语语言学界中的“田野”一词可能来自英文的 Field Linguistics（田野语言学）。有一本提倡这种研究的非常实用的书，书名就用了这个词（即戴庆厦等 2008）。在这本《语言学论丛》专号所收录的汪锋的论文里，他曾扼要地说：“有语言的地方，就是语言学的田野。”（汪锋 2024）换句话说，世界各地都可以是我们的田野。况且“语言”也不该局限于口说的语言，书面语也很可以是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此文中，我会先简述早年我对从事田野工作的印象，然后把讨论重点集中在近年来对四川的新发现上，探讨这些发现对中国语言学乃至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就理论层面而言，我想强调，正如一般的研究那样，田野语言学若能为更广博的问题所启发，而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而描述，其研究成果必定会有更深刻的意义，对语言的描述必须是由更大的目的所推动。让自己的双手不闲着固然很好，但让我们的头脑也不闲着则肯定更重要。

我还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受教于已故的 Kenneth Pike 教授，他是研究声调语言的权威专家，尤其是墨西哥的声调语言。几年后，也就是任教于伯克利不久后，我就开始循着 Joseph Greenberg 的思路去思索一些一般性的问题（Greenberg 1966）：声调语言中，哪些要素是理论上可能发生的（possible），哪些又是基于证据在概率上可能发生的（probable）（Newmeyer 2005）。我当时利用了辨义特征来解答这个问题（Wang 1967）。

收稿日期：2023-12-29；定稿日期：2024-04-22。

* 本文在“何为田野与田野何为”工作坊（2023 年 11 月 15—16 日，珠海）上报告过，得到与会专家的多处指正。之后又承蔡雅菁修改过全文，谨此一并致谢。

如果考虑能辨义的不同音高层次,“±高”和“±低”这两组二元特征就足以表达四种音高。曾有报道说中国和墨西哥境内,有的声调系统可以区分五种不同音高(Longacre 1952),不过我本人从来没分析过这样的系统。后来听说墨西哥有种不得了的声调语言叫阿卡特兰·米斯特克(Acatlán Mixtec)^①,这种语言有个叫升阶(Up-step)的特征,能重复提高后续音节的音高,我听闻后就特别想一探究竟。

Kenneth 的妹妹 Eunice Pike 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语言学家,当时任职于知名的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在她的协助下,我联络上了当时正在该院位于墨西哥市的分院工作的 John Alsop。他带我坐着吉普车长途跋涉南下。一路上许多泥土路面容易打滑,要靠四轮驱动才能行驶,我们最终到达了瓦哈卡(Oaxaca)附近的一座小村落。接待我们并参与调查工作的是 Martinez 先生。由于我的西班牙语水平很有限,所以我只能先用英语与 John 沟通,让他用西班牙语转述给 Martinez, Martinez 再用阿卡特兰语对着我信赖的 Nagra 录音机说给我们听。

有一晚微风徐来,我们坐在 Martinez 先生屋外的矮凳上,正在温习他的语言,他则一直在编要拿去卖的藤篮。当晚月光分外明亮,我一边用手指着月亮,一边看着 Martinez 先生。他很快有所反应,对着录音机说了个词。几天后我在整理笔记时,才知道他那晚说的词是“手指”,而非“月亮”。可见跨文化的沟通障碍很容易发生。语言学家在分析不熟悉的语言时,常急于做出许多预测,他们会自己造一些新句子,并一直缠着老师问“可以这么说吗”,以便验证句子是否合语法。有时老师如果有耐性,就会回答“没错,你是可以这么说,但我就一定不会这么说”。

我和 John 的确找到了许多具有“升阶”特征的词,当这些词紧跟在一个高调的音节后出现时,在音高上就要发得更高一阶,不然这个词本身读高调就行了。我那时很想知道,能否造一个有一连串升阶调的句子,这在语音上会产生什么效果。所以当我们找到足够多的词后,我和 John 就造了许多这类句子,上标的数字代表的即是音高(Wang 1972: 492):

- | | |
|---|--|
| a. ti ² i ² mba ³ le ⁴ | ‘小伙伴’(small compadre) |
| b. ma ¹ ti ³ i ³ mba ⁴ le ⁵ | ‘不小的伙伴’(not small compadre) |
| c. ma ¹ ti ³ i ³ yu ⁴ a ⁴ mba ⁵ le ⁶ | ‘不小的父亲伙伴’(not small father compadre) |
| d. ma ¹ ti ³ i ³ yu ⁴ a ⁴ di ⁵ ʔi ⁵ mba ⁶ le ⁷ | ‘不小的父母亲伙伴’(not small father mother compadre) |

Martinez 先生所说的这些句子,是从 John 给他的西班牙语句子中翻译而来。在说上组例句中最后一句时,发音人最后几乎到了要高声尖叫的地步,虽然他已料到声调会一路升高,所以起头时已刻意从很低的声调开始说。这当然不代表他对这些句子的音系结构有明确的理解——母语者一般对自己语言的韵律现象的物理基础所知甚少。

回到伯克利后,我把这些录音放在窄频的声谱图上,发现这些图的样子很特别。尽管粤语、日语和瑞典语这些所谓的声调语言,在基频上看来都很像一般的语言,但这些具有不断自我重复的重音的语言,却因其基频与基线大致维持平行的程度有别而有所差异。

二

我的第二次田野经验,是由对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的好奇心所驱使。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以及为了逃离某地或因向往某地,团体迁徙越发普遍,混合语也越来越常见。^②我感兴趣的是中国

① 有篇详尽的报道在我那次考察几年后发表了,详见 Pike and Wistrand (1974)。

② 关于中国西北的例子,详见 Xu and Li (2017)。语言学在这一领域的一部划时代著作是 Weinreich (1953),这种研究法的进一步扩充是 Weinreich et al. (1968)。关于中国西南的一篇早年研究是陈保亚 (1996)。

西北的回民为了反抗清廷而迁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例子。虽然早在 8 世纪时，穆斯林就已来到中国，但他们同化为主流人口的过程却艰辛复杂，动乱起义也屡见不鲜（Lipman 1997）。

杨昌浚（1826—1897）的一首诗就曾记录过这一事件，诗歌讲述了名将左宗棠统领湘军收复新疆的情景。诗人以左宗棠的军队在新疆沿途数千里遍植柳树的事来称颂战事的胜利，回民于是从中国西北被赶出了天山外。看来当时的人就已有环保生态意识。诗是这么写的：

（1）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清杨昌浚《嘉峪关七绝二首》，引自秦翰才（1946：130）]

东干的例子很宝贵，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确切的时间。在我们短暂到访的那个年代，当地的语言状况颇为复杂，也让该次调查格外有意思（Husmann and Wang 1991）^①。吉尔吉斯斯坦当时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此俄语还很吃香。Lisa Husmann 和我去的时候是 1991 年初，苏联在当年年底解体，吉尔吉斯斯坦也于 1991 年 8 月 31 日独立，改为吉尔吉斯共和国。其首府是伏龙芝（Frunze），以一位俄国将军命名；独立后首都改名为比什凯克（Bishkek）。除了俄语外，当地人也广泛使用属于突厥语系的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

该共和国的国名本身也有混合的来源：“吉尔吉斯”一词来自突厥语，“斯坦”则源自波斯语，意指“地方”，许多地名的拼写都能找到这个词根，如阿富汗（Afghanistan）、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根据吉尔吉斯斯坦 1989 年的人口普查，有 220 万吉尔吉斯人、90 万俄罗斯人、55 万乌兹别克人等。2022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吉尔吉斯人增长到 540 万、乌兹别克人 99 万，俄罗斯人则下降到 28 万。吉尔吉斯语属于突厥语系，曾以阿拉伯字母书写，1928 年改用拉丁字母。现在的斯拉夫字母于 1941 年才开始被采用。

我们当时是使用苏联的签证抵达伏龙芝的，苏联官方国家旅行社（Russian Intourist Office）负责接待我们。当我们要求去拜访东干人时，旅行社的人坚决表示没有这些人，并为我们安排了另一个官方行程。所幸才到伏龙芝不久，我们就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东干人的村落。

当地村民很高兴有中国来的访客，他们都非常热情。但我一提到他们的语言是中国方言时，他们很敏感地立刻表现出不悦，因为这有损他们的民族自尊。他们已放弃了使用汉字来书写母语，而改为使用斯拉夫的西里尔字母，而且不标声调。不过他们还是很在意保留自己的语言，会送孩子在课余时间学东干语。

离开前他们送给我们一本教科书，封面上印着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回族语言”四个字。下面的图取自课本中的一页，内容是托尔斯泰写的很有名的一个短篇故事，讲两个朋友在森林里遇到熊的故事。稍微了解西里尔字母的人会发现，如果和汉语拼音对照后，就会知道那段文字其实是中文。

例如，图中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西里尔字母的 л（希腊字母的 *lambda*），相当于汉语拼音的 l；第三个字母是西里尔字母的 н，相当于汉语拼音的 n；第一行的第四个字母是西里尔字母的 г（希腊字母的 *gamma*）。先不管元音，我们已经能猜到故事一开始的那个东干词是 *liangge* “两个”。我们也可以猜出第一行第六个词是 *manmandi* “慢慢地”，因为字母 M 很像西里尔字母的 д，且拼音的 d 相当于西里尔字母的 д（希腊字母的 *delta*）。

① 关于东干人的更多信息可参阅 Rimsky-Korsakoff（1967、1991）和 Hashimoto（1978）。

Лёнгә ляншу.

Лёнгә ляншу зэ фулинни зудилэ. Минмынди чўлэ-
лигә щүн. Йигә подичи шонли фу, чёнхали. Ди эргә
мә дунтан. Мә форли, та пахали, жуончын сыжыли.
Щүн до гынчан вынтуэ, та чи ду бу чўли. Щүн ба
тади лян вынлихар, дончын сыдёлл, зугуэли.
Щүн зудё, нэгә да фушон халэ, щётуэли: «Щүн ги
ни зэ эрдүшон чёчёр фэ сали?» Ди эргә хуэйдади:
«Щүн фэсы, ю бу хо жыни, таму до зуэнанчўр, ба лян-
шуму лёха, пони».

(Л. Н. Толстой).

图1 东干课本《回族语言》之一页

有个实用的语音线索能帮助我们理解东干语的历史来源，就是西里尔字母的 ϕ （即希腊字母的 *phi*），即第一行第四个词的词首。第四个词用拼音来写就是 *shulinli* “树林里”。这个很有意思的语音对应是，普通话里的清卷舌擦音对应于东干语里的唇齿擦音。第二行又出现了 ϕ ， ϕy 等于 *shu* “树”，而第七行的 ϕo 等于 *shuo* “说”。

这两种发音间的对应关系虽很罕见，但是在中国西北的西安方言里能看到。将来如果有学者研究东干语时，若能把其语言要素追溯到其他方言的源头将会很有趣。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确定，自唐代起的好几个世纪内，回族迁徙到吉尔吉斯斯坦，一定是分成好几波从中国不同地域迁入的。我们这方面的所知越透彻，就越能加强我们对中亚史的了解，尤其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丝绸之路。

三

我之所以对东干人好奇，其实是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对中国的语言和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Wang 2024）。早在几十年前，我和已故的张光直教授就常有交流，我也拜读过他关于这方面的代表作（Chang 1986），这个兴趣当时就被激发了。这个领域的文献很丰富，几千年来中文和许多其他语言的史料也不缺，但文献的质量却参差不齐。直到 20 世纪初，该领域才奠定了科学基础。因为考古学、民族学、遗传学和语言学开始探究共同的问题，每个学科相辅相成，各自为探知过往提供了宝贵的窗口（Wang 1998）。近年来，考古研究在古文物的化学定年上以及遗传学在从人类化石萃取古 DNA 进行分析上的进展，对建构我们的史前史知识也特别重要。

在张光直 1986 年出版的第四版的书里，有张地图标出了 11 个考古点：红山、土珠、大汶口、仰韶、大溪、马家浜、山背、河姆渡、昙石山、石峡和凤鼻头。这些地点被划归在几个圈内，圈与圈之间有双向箭头互相连接。该地图传达出的信息是：六千年前，这些地点已在彼此互动。从出土文物的形制就可证实这一点。张光直把以这种方式界定出的文化圈称为“初始的中国”（Initial China）。

欧洲语言里称呼中国有不同的说法，多半是类似 Chin- 的词根，这可能来自第一个一统的王朝秦帝国。但俄语是个有趣的例外，它把“中国”叫作 Китай /kitai/，也就是契丹。“中国”这一词的来源其实更古老，可上溯至西周时期。最早使用“中国”这个词，见于三千多年前一尊称作“何尊”的青铜器上，上面所刻的铭文就有著名的“宅兹中或（即‘國’）”四字。

张光直那本书虽然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还是因作者当时所知有限而不够全面。他自己在后续的著作中也提到了这一点（Chang 1999）。我们认为，科学知识永远不可能圆满——只要有新观察或新理论出现，科学知识也会随之发展。近几十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从夏、商、周起，在史书里线性更迭的朝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族群，主要是借由文化因素的凝聚才得以脱颖而出。以汉人为中心的叙事史观远非精确。自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 Modern Humans）移居亚洲后，不同程度的跨族群血统融合就一直

在发生，史前时代的原始部落间或合作或冲突，始终在彼此互动。

虽然“汉”一词可以清楚地联系到国祚绵长的汉朝，用它来指称一个族群不是血缘决定的，而是文化。中国用“汉族”来称呼官方所认可的国内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所谓的“汉人”其实是几千年来，邻近的各少数民族逐渐合并、融入、同化成主流族群的结果。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就曾以多元一体来解释中华民族（费孝通 2018）^①。“汉族”一词在 20 世纪初才开始盛行，因为政府要识别并承认境内的各种不同人群（贾敬颜 2018）。20 世纪 40 年代我在读小学时，课本上就教导我们中国是由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各族组成。1979 年，基于行政划分的目的，政府认可了 56 个民族，虽然还有不少族群也一直渴望被承认为独立的民族。

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这些中国的少数民族，是 1997 年 1 月在南开大学石锋教授的悉心安排下，到广西大瑶山做一次简短的田野调查。移居香港后，我也曾几次在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的带领下，短暂走访过云南和四川。有一次考察还特别以探寻茶马古道为题，陈教授曾多次论及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也有机会在台湾一本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语言多样性的美好和濒危语言存续的重要（王士元 2002）。

四

说到科学知识永远不会圆满，我们不妨看看张光直那张地图里的西南部。地图东部布满了考古点，但四川和云南两省却空空如也。幸运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四川广汉市的一次偶然发现在 1986 年后开始得到考古学界的瞩目，也促成了后续一次又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出土，震惊了世界。考古学家先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之后又发掘了时代稍晚、离成都不远的金沙遗址（段渝 2023）。古蜀国被称为长江文明之源，而古蜀文明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区的良渚文明在古城格局和出土玉器上都有相似之处（刘采采 2021），这印证了之前张光直所说的不同部族文化间的交流互动。

这些考古发现包括广阔的城墙、诸多墓葬区及大量海贝。出土的珍贵文物多半是象牙、青铜和黄金制品，包括饮酒器、动物、树木，特别是有非常多的人头像和面具。这些头像面具的形态令人惊异，因为都有着突出的眼睛和坚挺的高鼻，耳垂上还穿有大孔，表示当时人已会佩戴耳饰。有座立人雕像甚至高达 2.6 米，双臂前伸捧着一件大而弯的东西，虽然手抱之物已经不见，但可能是一支象牙。

虽然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几个看似文字的刻符，但目前除了媒体上报道的之外^②，似乎还不能确切说明这些符号代表的意义。这些文物产生的年代大致在商代，而商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 1600 年到前 1046 年。大量的商代甲骨文在 20 世纪一被发现时就令人惊叹，为我们了解远古时期的中国提供了珍贵的信息来源。^③三星堆遗址所展现出的文化成就既然已达相当水平，为什么至今还未发现成熟的文字，也不禁让人疑惑。^④

① 时间上溯得越久远，多元的成分可能越大。两千多年前扬雄已开始记录的《方言》显然涉及不同的语系，虽然还没有研究揭示过这些语言间的明确关系。Chang（1983：25、27）指出：“根据顾祖禹（1624—1680）统计，大禹时代约有一万个‘国’，到了建立商朝的商汤晚年，国的数目已经降到三千多个。再到克商的周武王时，只剩 1800 国了。自东周开始（公元前 771 年）还剩 1200 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末年（公元前 481 年），仅剩百余国，其中只有 14 国称得上是大国。”Chang（1983）所引的书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读史方輿记要》里的原文为：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在南直怀远县东八里），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

② 《四川日报》（2021 年 3 月 22 日）：古蜀文明有无文字 巴蜀符号代表什么。参见网址：<http://sc.people.com.cn/BIG5/n2/2021/0322/c345458-34633065.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16 日。

③ Li（1957）一书对甲骨文的偶然发现有动人的描述。

④ 这个谜团激发了不少讨论，可参阅陈保亚（2009）、最近的《四川日报》（2021 年 3 月 22 日）中一文《古蜀文明有无文字 巴蜀符号代表什么》，以及巫达（2012）。

我们很希望见到的另一发现是人类化石。要研究史前人类的迁徙，更多地得依靠古 DNA。关于最新进展的一个概述可参考 Melinda Yang 对亚洲的相关调查（Yang 2022）。大众传媒上虽有发掘人类遗骨的报道^①，但还没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有证据显示三星堆和同时代的商代间存在文化交流，理想上，有朝一日，但愿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三星堆和古代的巴蜀国以及和现代也许是说藏缅语的民族联系起来，甚至也可能和东南亚甚至南亚的文化或人群扯上关系。无论如何，发现文字记录或古 DNA，都可为我们大大揭示出关于这些宝贵且神秘的遗址在史前时代的来源。这将深化我们对中国西南地区，也就是张光直地图上那一片空白地带的史前史的认识。

回到文章一开始所说，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就是可供语言学家调查的田野。解答出三星堆在极盛时期说的是什么语言，将是语言学家对理解中国史前史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 陈保亚（1996）《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北京。
- 陈保亚（2009）解读蜀夏文化的一线曙光——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汉藏语系研究的启示，《科学中国人》第 9 期。
- 戴庆厦、罗仁地、汪 锋主编（2008）《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民族出版社，北京。
- 段 渝（2023）《发现三星堆》，中和出版有限公司，香港。
- 费孝通主编（201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 贾敬颜（2018）汉人考，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 刘采采（2021）《古蜀之国：三星堆国宝背后的蜀地文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
- 秦翰才（1946）《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上海。
- 汪 锋（2024）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假设与实践，《语言学论丛》第 4 期。
- 王士元（2002）语言是云南的文化宝藏，《科学人》10 月号。
- 巫 达（2012）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民族学刊》第 6 期。
- Chang, Kwang-Chih (1983)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wang-Chih (1986) *The Arch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wang-Chih (1999)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In M. Loewe and E.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37-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Harold (ed.) (1966)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shimoto, Mantaro J. (1978)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Zhunyanese (Soviet Dunganese)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 243-267.
- Husmann, L. E. and William Shiyuan Wang (1991) Ethnolinguistic notes on the Dungan. *Sino-Platonic Papers*, 27: 71-84.
- Li, Chi (1957)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ipman, Jonathan N. (1997)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ongacre, Robert E. (1952) Five phonemic pitch levels in Trique. *Acta Linguistica*, 7: 62-81.
- Newmeyer, Frederick J. (2005) *Possible and Probable Languages: A Generative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ke, Eunice V. and K. Wistrand (1974) Step-up terrace tone in Acatlán Mixtec (Mexico). In R. M. Brend (ed.), *Advances in Tagmemics*, 81-104. Amsterdam/New York,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American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 Rimsky-Korsakoff, Svetlana (1967) Soviet Dungan: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Alphabet, phonology, morphology. *Monumenta Serica*, 26: 352-421.

^① 四川新闻网（2015 年 6 月 13 日）：三星堆发现疑似古城墙遗址 墓葬中惊现完整人骨，参见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13/c7073127149868.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16 日。

- Rimsky-Korsakoff, Svetlana (1991) *Soviet Dzungars in 1985*.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Wang, William Shiyuan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2) : 93-105.
- Wang, William Shiyuan (1972) The many uses of F₀. In A. Valdman (ed.), *Papers in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to the Memory of Pierre Delattre*, 487-503. Berlin: Mouton.
- Wang, William Shiyuan (1998) Three windows on the past. In V.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508-534. Washington, D.C.: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中译版: 徐文堪译 (2002) 探索过去的三个窗口, 载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
- Wang, William Shiyuan (2024)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the languages and peoples of China. In Liwei Jiao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237-255. London: Routledge.
-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New York: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
-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and Marvin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infred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95-188.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Xu, Dan and Hui Li (eds.) (2017) *Languages and Gen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 Singapore: Springer.
- Yang, Melinda (2022) A genetic history of migr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admixture in Asia. *Human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Genomics*, 2(1) : 0001. <https://doi.org/10.47248/hpgg2202010001>.

What is Fieldwork in Linguistics: A Brief Account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William Shiyuan WANG

Abstract: Though I myself have not done much field research, it has taken me to places like Mexico, Kyrgyzstan, Dayaoshan, Yunnan and Sichuan. This essay will first briefly recount some interesting stories of my fieldtrips there. Then based on these experiences, I will provide some linguistic observations on tone language and language contact. I will also try to discuss the newly excavated Sanxingdui 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human migration, ethnic amalgam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Finally, I hope that future linguistic research will soon reveal something about the linguistic profile in the ancient Bashu culture.

Keywords: Donggan, language contact, distinctive features, diversity in unity, Sanxingdui

999077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wsywang@polyu.edu.hk